

再論政治、理論與 中國文學研究——答劉康

● 張隆溪

今年1月出版的《近代中國》(Modern China)是有關意識形態、批評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專號，出刊以來，劉康先生已在1993年夏季出版的《今天》和1993年10月出版的《二十一世紀》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對林培瑞(Perry Link)、杜邁可(Michael S. Duke)和我發表在《近代中國》上的文章作出回應。我當初決定參加《近代中國》展開的討論，是因為討論的問題，即政治、理論和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在我看來很值得探討。由於同樣的原因，在李陀先生向我為《今天》文學雜誌約稿時，我把要在《近代中國》發表的文章用中文寫出來，在《今天》上發表。文章印出來之後能引起進一步討論，使更多人關注這類問題，在辯論之中加深理解，應當是一件好事。由於見解不同而互相討論甚至爭辯，也是學術得以進步的正常健康的現象。不過要展開正常的學術辯論，需要一個起碼的條件，那就是論辯各方要把對方的意見完整地

表述出來，然後再作評論或辯難。如果把論敵的話截頭去尾加以歪曲，然後去批駁那已經被歪曲的對方，則實在是自欺欺人的做法，談不上學術論爭了。很遺憾，劉康發表在《今天》和《二十一世紀》上的「回應」文章，並沒有滿足學術辯論這起碼的條件：我在進一步討論實質性問題之前，也就不能不先澄清事實，恢復被竄改歪曲了的文字的原貌。

劉康批評西方漢學界把中國現代文學視為政治學和社會學文獻，而且由於濃厚的冷戰意識，對中國左翼文學抱有偏見。他認為杜邁可堅持這種偏見，而「張隆溪則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現代文學都是『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而製造出來的『極枯燥無味的宣傳品』」。劉康接着就指出，「張文對現代文學斷代史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因為現代文學包括中共掌權以前的作品，不能說全都是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品；而犯這錯誤的原因，他也診斷出來，說是「一種『政治無意識』」。

劉康批評西方漢學界把中國現代文學視為政治學和社會學文獻，而且由於濃厚的冷戰意識，對中國左翼文學抱有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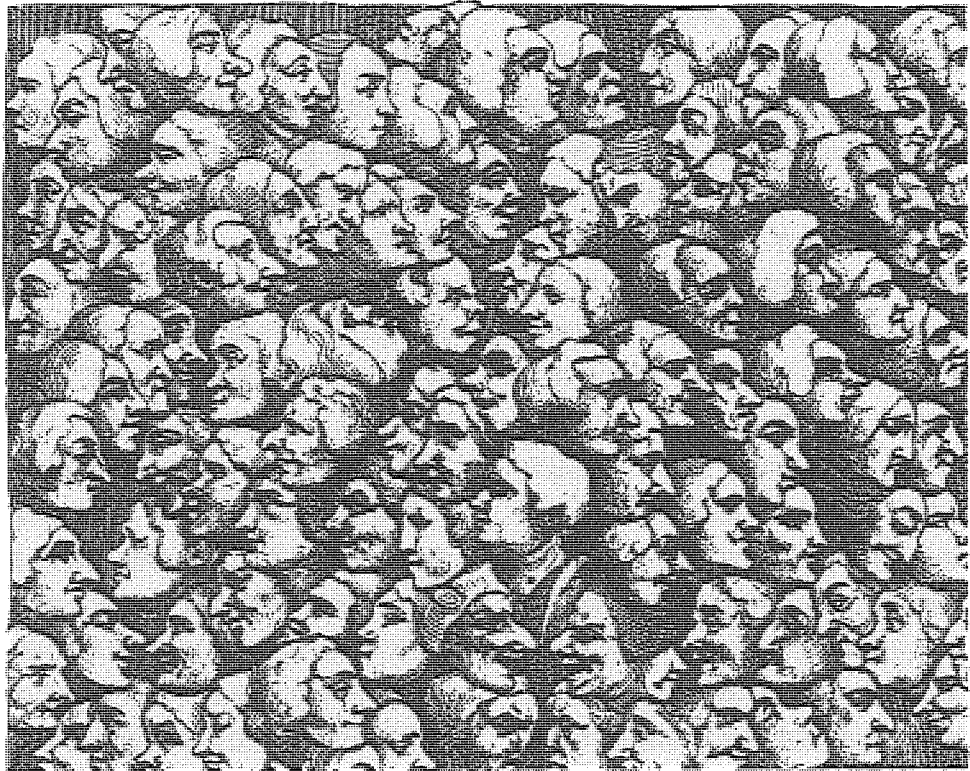
的反映」^①。劉康的話似乎很有道理，怎麼能說「中國現代文學都是」共產黨控制下製造出來的「枯燥無味的宣傳品」呢？但是讀者如果對照我的原文，就會發現犯這常識性錯誤的不是別人，正是劉康自己。我的原話說得很清楚：「為推進黨的路線和政策，為說明其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製造出來的文學作品，把黨的路線形像化作為自己存在理由的作品，都不過是極枯燥無味的政治宣傳品。」^②我這裏所說的「作品」有明確的限定語，幾乎避免了任何誤解的可能性：不顧這明確的限定而把我所說的「作品」強行解釋為全部中國現代文學，那不是缺乏基本語文常識的誤讀，就是缺乏基本道德準則的惡意歪曲。劉康很反感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認為他一方面過分推崇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這些「游離於左翼文學主流之外的「經典作家」」，另一方面又貶低了「楊朔的共產主義小說《千里江山》」^③。我則強調親身經歷過中國大陸全盤政治化災難性後果的人，不應該忘記文學為政治服務產生出來的是多麼枯燥無味的政治宣傳品，不應該忘記我們閱讀經驗的這樣一個事實：即「在80年代比較開放和寬鬆的氣氛裏，中國大陸上的讀者和批評家們重新發現的恰好正是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這樣的作家，而楊朔這類唯黨命是從的文人則很快被人遺忘了。」^④換句話說，我並不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都是圖解黨的政策枯燥無味的宣傳品，因為除《三千里江山》這類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而外，中國現代文學還有很豐富的內容，很傑出的文學創作。一見別人對公式化概念化的政治宣傳品表示反感，就說這是在「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現代文學」，不知按劉康自己

的分析，這又是反映了哪一種「政治無意識」？

劉康並不僅僅斷章取義地摘引個別字句來歪曲對方的原意。他說：「張隆溪認為，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筆者(即劉康)是運用『第一世界理論』來描述『第三世界經驗』。」^⑤這就不是歪曲，而完全是編造對方的所謂「用意」了。首先，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為」，我也絕沒有說過用任何理論來「描述」任何經驗這種不通的胡話。儘管劉康現在以新馬克思主義為標榜，我卻並沒有把詹明信和他混為一談。我在《近代中國》和《今天》上發表的文章，第一部分就是討論詹明信涉及現代中國文學的著作，尤其是他對老舍和魯迅的評論。雖然我對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民族諷寓」(national allegory)的概念有所批評，總的說來我認為詹明信的著作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也不時有深刻的洞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詹明信的著作提出了理論的挑戰，而回應這種挑戰，討論超出專題局限的帶普遍性的理論問題，正可以幫助中國文學研究走出少數學者感興趣的自我封閉的小圈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反駁了斯蒂芬·歐文對北島和當代中國詩不公正的評論，指出歐文和余寶琳強調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絕然不同的文化差異，實際上是把中國文學變成為西方提供異國情調的「非我」，而且把中國文學研究推入文化的封閉圈裏。我文章的題目是〈走出文化的封閉圈〉，而要走出去，第一步就要拆除學術的藩籬，打破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文學批評和理論探討之間互相隔閡的界限。在這種情形下，接受理論的挑戰，研究各種各樣的西方理論，

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詹明信的著作提出了理論的挑戰，而回應這種挑戰，討論超出專題局限的帶普遍性的理論問題，正可以幫助中國文學研究走出少數學者感興趣的自我封閉的小圈子。

理性而真誠的對話，
是建立學術典範的基礎。



如果說批評理論是對文學和文化作批判的思考，那麼採取真正具有理論性的立場，首先就要對理論本身作批判的思考。而這種批判思考的基礎是實踐經驗，包括閱讀作品的經驗和更廣泛意義上現實和政治生活的經驗。

在比較研究之中加深對東西方文學和文化的理解，就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充分認識當代西方批評理論的重要並不意味着全盤接受西方理論，把各種理論機械地搬到中國作品的閱讀中去。如果說批評理論是對文學和文化作批判的思考，那麼採取真正具有理論性的立場，首先就要對理論本身作批判的思考，以達到對自己所取理論立場的自覺意識；而這種批判思考的基礎是實踐經驗，包括閱讀作品的經驗和更廣泛意義上現實和政治生活的經驗。劉康以鄙薄的口氣問道：「不知道這是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論斷的翻版？」^⑥我的回答很簡單，既然我不主張從理論到理論，也就不存在任何論斷「翻版」的問題（我也不想用文革大批判中用濫的「翻版」之類說法）。值得考慮的倒是，何以劉康對實踐經驗這樣反感？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的第二條裏說：「人的思維是否能達到客觀真理的問

題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必須在實踐中證明他的思想的真理，並即其現實性和力量，其此岸性〔Diesseitigkeit〕。脫離開實踐去爭辯思想的真實與否，則純粹是一個經院式的問題。」^⑦不知道我們這位新馬克思主義信徒是否讀過馬克思這部著作？我發表在《近代中國》上的文章的第三部分，正是針對劉康完全不顧中國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現實而硬搬西方理論的做法，坦率地提出批評。

劉康的文章不僅批評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夏志清的形式主義和李歐梵的歷史主義，也批評劉再復的人道主義和80年代中國文學非政治化的傾向。劉康把話說得很明白^⑧：

在西方和在毛以後的中國，毛的觀點都成了攻擊中國共產黨文化專制主義的中心目標。但是正當福柯所揭示的權力與知識的串通關聯以及在歷史和

審美文本的話語形成當中的政治運作，被盛讚為對統治西方人文學科的自由派人道主義神話所作的有力批判時，人們卻往往忘記了，無論好歹，毛關於政治和審美的關係的觀念事實上很可能激勵了福柯對西方自由派人道主義的激烈批判。……80年代後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衛作家和批評家們企圖通過培植語言或藝術形式的審美客體，反抗文學中毛的政治統率。但這審美化的行動本身即是政治性的。它恰恰證明了毛關於文學和文化的活動都是政治活動的觀念，而不是動搖了這一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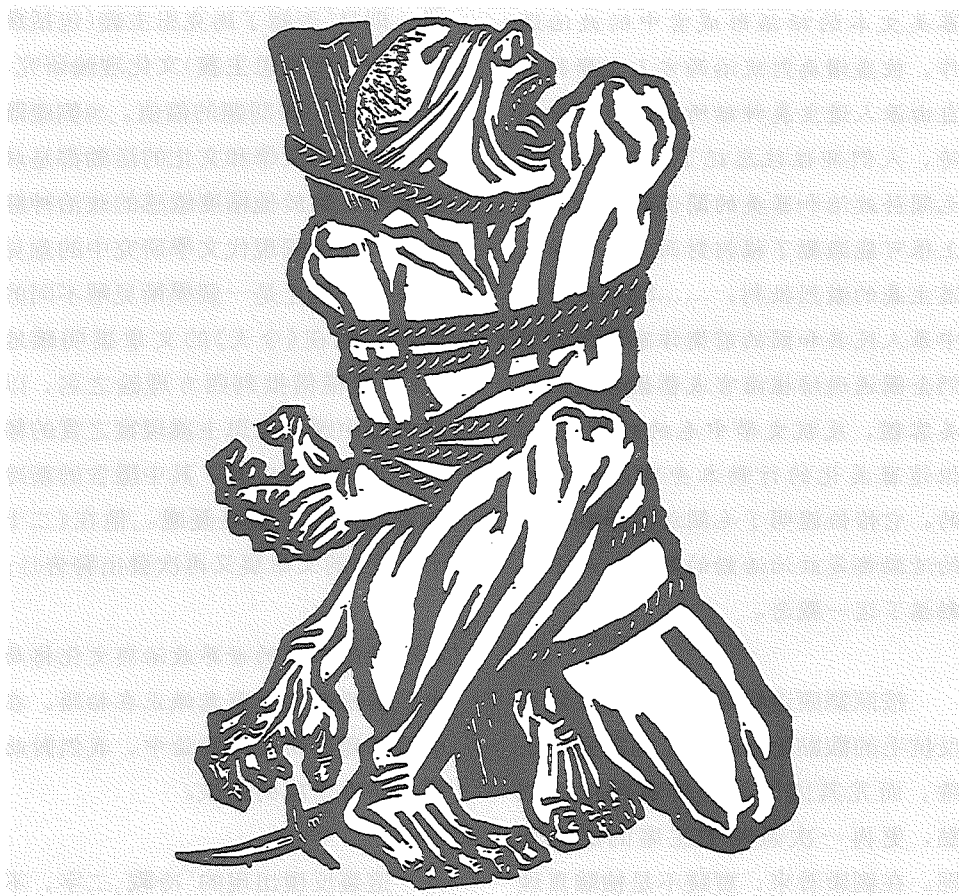
按照劉康這段話的意思，攻擊和反抗毛的觀點恰恰證明了毛觀點的正確，而尤其因為福柯持有類似的觀點，更再一次證明毛主席的話是真理。在劉康看來，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福柯或者說西方理論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既然當今赫赫有名的西方理論大師福柯都受到毛的激勵，我們還能不趕緊對毛的真理頂禮膜拜，三呼萬歲嗎？既然我們有幸生長在毛的中國，對毛的真理比西方人到底接近幾分，在談論政治、意識形態和馬列主義之類問題上，說起話來不是也更有分量嗎？在這種時候，還老提不要忘記甚麼第三世界的經驗，老唸叨甚麼極權主義政治的災難，豈非不識時務的死心眼，豈不是大煞風景嗎？我和劉康的分歧，大致就在如何回答這類問題上。我確實認為劉康以福柯證明毛的正確是「把西方當代理論及其政治辭藻視為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絕對價值標準」^⑧。在劉康看來，我強調以實踐經驗作為理論立場的基礎不過是「經驗論」，而我拒絕服從由毛到福柯到新馬克思主義的諸位權

威，則是「否認了馬克思主義(包括詹明信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並且思考中國問題的價值。」^⑩劉康既然強調一切文學和文化的活動都是政治活動，對於他極度敏感的政治神經說來，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意見分歧就不僅止是一個學術見解不同的問題。他在《今天》的文章裏明確地說：「這種借批判西方理論之名，以達否定中國馬克思主義現實之實的傾向，非但曲解史實，其中隱含的新冷戰意識形態，更堪憂慮。」他在《二十一世紀》的文章裏又再次發出警告^⑪：

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與文化格局中，某種新的冷戰意識正在抬頭。在中國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中，我們對此更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這裏反覆出現的「冷戰」二字，不啻在向論敵宣戰，大有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架勢。也許對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階級鬥爭仍然是看家的行當，但我卻以為大可不必這樣緊張。一視為「冷戰」，便容易壁壘分明，把問題絕對化，參戰的人就必須在對立的兩方中作出選擇，不是東方，就是西方；不是擁戴蘇聯，就是依靠美國。那種情形絕不是我心目中學術辯論的正常狀況。對我說來，最可寶貴的是思想的獨立和自由，而思想可以馳騁的空間是高遠寥廓的，其中絕不僅止非此即彼的兩種選擇。對西方各種理論，我都有瞭解的興趣，但是我並不把任何一派理論視為絕對真理，也絕不盲從任何一位理論權威。在文學研究中，在學術論爭中，我也絕不把自己網綁在任何一派的戰車上。正是思想自由和學術研究中多元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擺脫階級鬥爭你死

既然我們有幸生長在毛的中國，對毛的真理比西方人到底接近幾分，在談論政治、意識形態之類問題上，不是也更有分量嗎？在這種時候，還老唸叨甚麼極權主義政治的災難，豈不是大煞風景嗎？



我活這種「冷戰」心態。我在《近代中國》和《今天》上那篇文章的最後一部分裏，提出爭取更大的開放性，也就是希望建立和鞏固這種思想自由和學術多元的觀念。

基於開放和多元的立場，對任何人提出的商榷和進一步探討，只要言之成理，只要有利於加深對所討論問題的認識，我都竭誠歡迎。劉康的所謂「回應」卻使人相當失望，因為他既沒有認真討論問題的誠意，也不從正面展開論述來批駁我的觀點，卻一面斷章取義，歪曲原意，一面抓住他自認為抓得住的漏洞來冷嘲熱諷，旁敲側擊。例如我在文章裏引用了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的一段話來說明依靠經驗並不是反對理論，卻恰恰具有理論意義。劉康似乎覺得這是可以利用的一個機會，便以一個權威解釋者的口吻

說^②：

但是伽達默的解釋學有一個重要的論點，即是一切理解和經驗都不可避免和無法脫離其歷史的「偏見」。「偏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自己的偏見熟視無睹，或當成一種財富來四處炫耀。

按劉康的說法，經驗難免有偏見，強調實踐經驗就是把自己的偏見拿來四處炫耀。在他這句話裏，偏見顯然是要不得的東西。可是伽達默所謂「偏見」，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理解的「先結構」。在理解任何事物的時候，我們的頭腦都不是一塊白板，卻已經先有理解那個事物的基礎，對所理解的事物已先有一定的概念，所以伽達默所說的 Vorurteil (英譯 prejudice)，正

在理解任何事物的時候，我們的頭腦都不是一塊白板，卻已經先有理解那個事物的基礎，對所理解的事物已先有一定的概念，這也正是我們理解事物的基礎，而不必一定是錯誤的成見。

是我們理解事物的基礎，而不必一定是錯誤的成見^⑬。劉康滿以為可以用伽達默的「偏見」概念來駁斥我強調的現實經驗，但看來他對伽達默的哲學，還未能得其門而入。更為可笑的是，劉康滿有把握地說我把自己的文章譯成中文在《今天》上發表時，更改了題目，「從原文的『走出文化的貧民窟』改為『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這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改動。原文將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文學研究稱為『貧民窟』(ghetto)，張大概亦覺得不妥。」^⑭懂英文的人都知道，ghetto的原意是大城市裏猶太人的居住區，就像華人居住區稱唐人街或中國城(Chinatown)一樣。那裏的居民主要由於種族而非經濟的原因才住在一起，像莎士比亞劇中夏洛克那種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儘管有錢，由於種族的原因，就得住在ghetto裏。說ghetto是種族隔離的結果則可，說是貧民窟則不可，貧民窟在英語裏有slum一詞來表示。Ghetto的引申義是隔離起來的小圈子，ghettoize作動詞就有隔離在某一區或限定在某一範圍的意思。這些都是淺近的英文，劉康既然在用英文寫文章發表，應該說是懂英文的，不知何以會發生這樣的誤解？當然，懂英文也像溫度計一樣，可以有各種度數的。如果所謂回應和商榷僅僅停留在這樣的水平上，就很難有甚麼學術上的意義，也實在沒有進一步回答的必要。不過意識形態、西方批評理論和中國文學研究的確構成一些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感興趣的讀者們不妨把93年第一期的《近代中國》找來看看，說不定有人會有更進一步的想法和見解，能夠使我們的討論在更高的一個層次上展開。

註釋

- ① 劉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兼答林培瑞、杜邁可、張隆溪教授〉(以下簡稱〈轉型〉)，《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號)，頁125。這裏所引的第一句話又見於劉康：〈理論與現實——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潮的嬗變〉(以下簡稱〈嬗變〉)，《今天》(1993年第2期)，頁185。
- ②④⑨ 張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今天》(1992年第4期)，頁219；219；217。
- ③ 〈轉型〉，頁122；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January, 1993), p. 20.
- ⑤⑥ 〈轉型〉，頁125；〈嬗變〉，頁186。
- ⑦ 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 28.
- ⑧ 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p. 14.
- ⑩ 〈轉型〉，頁126；〈嬗變〉，頁186。
- ⑪ 〈嬗變〉，頁186；〈轉型〉，頁126。
- ⑫ 〈轉型〉，頁126。
- ⑬ 參見 H-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p. 265-77.
- ⑭ 〈轉型〉，頁127，註3。

張隆溪 四川成都人。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比較文學副教授。著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三聯，1986)和《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比較的文學闡釋學》(英文，杜克大學出版社，1992)等書，並有多篇論文在中、英文學術刊物上發表。